

中国古代区域史中的国家史

孙竞昊 孙 杰

一 本质化的取向：中华帝国的整体史与宏大叙事的缺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区域史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但与此同时，区域史研究也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①这涉及如何看待局部区域史与整体国家史或中华帝国史的关系。

中外学术界对中华文明、中华帝国整体史的诸多宏大叙事至今还是我们审视和评判的圭臬，纵然它们不断受到质疑、挑战和修正。宏大叙事最关注的是政治史，包括政治和法律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它高度重视大一统国家政权的作用，从而对中国古代国家特别是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帝制阶段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文明的实质、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的特质进行总体定性。

长期以来，五种社会形态是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观念。欧美学者虽然视角和观点不同，但也倾向于以西方为标准或参照系对中国国家和文明进行整体评判。^②如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法律、宗教文化、城市与资本主义、历史模式的经典论述吸引了几代追随者。而费正清等战后第一代汉学家关于近代中国转变的“冲击-反应”模式把中国历史截然分成自我运转的传统社会和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的现代社会。非西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趋于把开埠前的中国整体定位于线性链条中的前现代，而忽视中国不同区域空间的差异性以及历时演化的复杂性。^③

① 《近代史研究》特于2012年第4、5期辟专栏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区域史所遭受的“碎片化”批判是论者提到的问题之一。

② 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的前三章，梳理了二战后“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前的欧美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整体史的研究，可供参阅。

③ 关于西方现代主义史观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体现，以及后现代主义对其的批评，可见孙竞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趋向》，《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

这些预设和思维中的一元论、因果论、目的论的线性整体史发展模式省略了历史过程的多元性、多义性和偶然、或然性因素，忽视了事物存在及发展态势的多样性、不规则性、不平衡性。其具体表现，一是对诸如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和层面的过分强调，掩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①漠视了气象万千的基层社会生态；二是对作为实体的“大中国”的考量遮碍了区域的视野。相反，如果从各个“局部”空间的角度、从社会的层面看历史会有不同的发现，不仅能更为确切地反映难为总体论断所容纳的本区域的特色，而且也可能对国家整体产生不同的认识。

二 眼光的向下与深入：社会史与区域史研究的结合

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崛起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流行都意味着将关注点投注到“国家”之外的区域或地方社会场景里。^②在这里，政府官员、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都参与了进来；基层大众的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特别为社会史学家所重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老一代历史学家谭其骧就指出“中原王朝”没法覆盖中国历史，而且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各个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体貌”，即便在同一阶段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区”，承认这些差异性并不否认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的共同性。^③傅衣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多元社会结构难用“一套适用于欧洲社会的模式进行规范”，强调研究者应重视区域间的差异性与多元、多线的中国历史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实际控制基层社会的是各个地方的乡族势力，而且各区域“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态平衡的改变、历史上开发时间的先后，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等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社会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万别，而且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周期性的和不规则的变化”，因此，他倡导开展“社会经济史区域性研究”。^④

在欧美，如果说费正清等人确立了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关于中国整体研究的基本框架的话，20世纪60年代以来创立和渐次成熟的中国区域史分析模型的“施坚雅模式”从方法论上启动了关于中国区域史及其地方基层结构的研究。^⑤施坚雅宣称

① 虽然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但其引发了研究视角的转换却是事实。

② 关于中国地方史热在欧美的兴起，参见艾恺（Guy Alitto）《当前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地方史的趋势》，《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③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

④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⑤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区分“区域性”的现象和“帝国范围”的现象，而“区域周期”比“王朝周期”更能逼近具体的、动态的历史真实，因为“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不可能由穿越差异的一般概括或各不同区域系统的强制平均而达到。相反，整个文明史必须基于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独特而又有条件地相互联系的历史的理解与和谐之上”。^① 如此，历史进程的分析应该以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单元展开，这正是区域分析的理论基础。

区域史是一种方法论。中国历史的复杂性难以用一以贯之的线索来归结。因为“国家历史”不是诸多地方的总合或抽象，地方或区域史有其自身相对独立运动的机制和轨迹。帝制时区域史研究注重的是中华帝国内的差异性、异质性、不平衡性、多元性，从认识论上挑战普遍模式和僵硬定性，如“大一统”、“小农经济”、“停滞”等习以为常的论断。因为注意到研究对象、重心在区域内“地方叙事”的语境中所出现的变化，尽可能地占有资料、挖掘整体史考察所不易注意或重视的问题的细化专题研究便成为区域史或地方社会史的主要特色，无数个案、专题研究的成果丰富了我们的关于“大一统”下各个区域、各个地方社会的知识。

勃兴的区域史研究也有利于对一些重大史学命题进行集中、深入、细致的解析，更加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从而自觉地检验从西方或欧洲经验提升出来的模式和学说的适用性。比如，迄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缺陷之一是在辽阔的帝国范围内捕捉新生产方式“萌芽”的蛛丝马迹，而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则倾向于体认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系统的“江南”，对之加以全面、系统而具体的考察，从而推进了对至今纠缠着众多研究者的资本主义或近代化何以没有发生的问题的认识。^②

三 超越区域：在区域社会史中探视中华帝国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内在逻辑

总的说来，近二三十年的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硕果，更多的是面的拓宽和量的增加，按陈春声的说法，“主要限于地方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鲜少突破既有通史框架的“思想”创新。而在以大一统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文化语境里，理解区域社会经济的精髓不在于“归纳特点”，而在于将“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

① [美] 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著，新之译：《中国历史的结构》，《史林》1986年第3期。

② 比如，“加州学派”把明清时期的江南从帝国中抽取出来与同时期的英格兰比较，要远比笼统的中西或中欧比较具有实际意义。

具特色的表达”。他将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归诸“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之阙如。^①

中国由众多大小区域组成，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技术和通讯不够发达的前现代尤其明显，区域史的首要任务自然是研究区域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但这种区域差异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差异性的区域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到大一统帝国的运转、起伏。首先，经济和政治中心地区成为左右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从而规定社会发展的主要轨迹，按冀朝鼎“基本经济区”的定义，即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来“控制基本经济区”的方式实现大一统。^②其次，“不重要”地区的变动、发展也会影响到整体主流社会运动的脉络，而且在经济中心的转移中有可能转化成“基本经济区”。于是发生的一个常见现象是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分离，特别是宋以来的晚期帝制时代里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南、北方分离，定都北方的帝国统治者运用财赋、军政手段强力支配南部尤其是江南的财富，使得帝国的历史运动复杂。因此，区域史研究必须放在更大空间范围乃至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里与其他地区联系或比较的视野里得到理解。

以精湛的经验主义实证研究著称的日本学者向来重视中国地域社会史，而且不少作品小中见大，斯波义信的江南经济史研究是个杰出的例子。沿循日本学者的传统路数，他强调“必须有史料上的积累才能提供个别与全体关系一望而知的推论”。同时，借鉴西方学者的宏观视野，“利用局部事例研究和地域史研究的手法，只要得到整体史观（holistic perspective）的证实，就能达到这一目的”。他研究长江下游流域或江南，“并不认为江南的事例是宋代经济的典型。这也可以说是积累其他地域的事例研究，以达到解析总体全貌程度的一种过程性的尝试”^③。

局部与整体犹如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各个局部的解决成为逼近整体的途径。如此，区域史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认识作为个案的区域本身，而且有助于对国家整体史的认识。于是，区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归宿还在于对中华帝国整体史的理解和把握，并不是局限于孤零零的区域个案，也非仅凭借一两个新线索的发现来填补漏洞、空白，而是从局部、微观、特殊性中找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反映整体的现象和规则，“通过区域史的研究角度透视中国历史演变的总体趋势，形成‘整体史’的研究视野”。例如“华南学派”的研究虽然是区域的、民间的，但“最后考虑的问题基本上

① 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② 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

③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都是整个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问题”^①，这就“体现了一种重写通史的努力”^②。

浙江大学历史系十几位同仁正在从事一项全面检讨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合作课题，力图在总结该领域丰硕成果尤其是众多个案、专题研究的同时，探寻突破瓶颈的思路。立足于在区域中探视中华帝国整体发展脉络的史观，我们初步地认为：与华南不同，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江南本身就是帝国的经济命脉和文教中心，始终与国家政权紧密相连，不仅体现在官僚机构在江南的行政建制以及财经统治的机制里，也体现在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庞大士绅的活动中。^③ 帝国与区域、王朝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起伏不仅制约着地方社会的生态变化，而且也成为中华帝国历史内在发展逻辑的动力。在这里，区域史本身就是国家史。

[作者孙竞昊，1964年生，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教授；孙杰，1986年生，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收稿日期：2013年10月10日

-
- ① 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郑振满教授访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页。
 - ② 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 ③ 例如国家的重视程度不同，江南与华南的“地方精英”（地方事务的主导者）的构成成分及其与国家的联系程度不同，甚至江南国家话语性文本与华南“民间文献”在比重上也各有千秋，这些都反映出在江南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关联尤为密切。